

米尔顿·弗里德曼 和他的货币主义

胡代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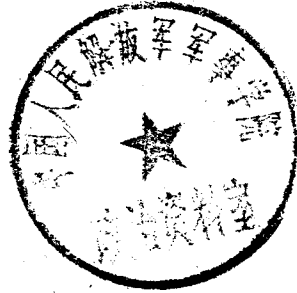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



2 019 0298 6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 他的货币主义

胡代光 著



商务印书馆

1980年·北京

081818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
他的货币主义**
胡代光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3 1/2印张 70千字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900册

统一书号：4917·210 定价：0.30元

序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已成为“正统派”或所谓“主流经济学”。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把凯恩斯主义作为制定和推行国内外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企图借助这个法宝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资源最优配置等六大经济目标。在战后二十多年期间，由于凯恩斯主义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推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出现过增长较快，失业下降，通货膨胀率不算高，垄断资本主义急剧发展等情况。然而，好景不长，到六十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七十年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处于“停滞膨胀”境地，即一方面存在经济停滞或衰退和严重失业，另一方面又有持续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面对着这样的现实状况，资产阶级谋臣策士们也不得不承认凯恩斯主义失灵了。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乘机兴起，向凯恩斯主义挑战，揭露它给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的恶果，吹嘘只有采用货币主义的处方，才能在资本主义国家实现高度就业，经济增长，而又没有通货膨胀。1976年，由于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货币主义逐渐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青睐，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已成为时髦理论。但凯恩斯主义者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当前，无论在垄

断资产阶级政府里，还是在资产阶级学术研究机构 and 大学校园内，或者在资产阶级舆论界，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间的争论正在激烈进行，似呈“抗衡”之势。

为了就货币主义及其与凯恩斯主义争论的情况提供一点材料并加以评论，作者于1977年10月写出本小册的初稿，后来经过半年多时间，作者对初稿作了修改、补充。陈岱孙先生、罗志如先生、厉以宁同志对初稿内容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特别是三十几年前大学同窗挚友宋承先同志仔细审阅了原稿，并加以删改和补正，使我获益甚多。对于他们的热忱帮助，作者在此表示衷心感谢。自然，书中如有缺点、错误，当由作者自己负责，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写于北京大学

1978年10月

目 录

- 一、米尔顿·弗里德曼何许人也? 4
- 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8
- 三、“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反科学性.....17
- 四、为垄断资产阶级效劳的弗里德曼的经济政策.....34
- 五、货币学派和凯恩斯学派实际是一丘之貉.....62
- 六、诺贝尔奖的获得，分枝意见的掀起.....93



当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特别是在美国，流行着所谓“货币学派”，或叫做“货币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被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相“抗衡”。据西方报刊报道，按照货币主义提出的“货币供应的增长目标现在正成为国际时髦”。①

什么叫做“货币主义”？据说，“货币主义”(monetarism)这个词是由美国罗契斯特大学管理研究院的经济学教授卡尔·布朗纳(Karl Brunner)首先创造的。它是发源于芝加哥大学的一个经济思想流派，由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领导(因此，这个思想流派有时又称为“芝加哥学派”)。货币主义的中心命题是：(1)货币最要紧，货币的推动力量是说明产量、就业和物价的变化的最主要因素；(2)货币存量(或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货币推动力的最可靠测量标准；(3)货币当局的行为支配着经济周期中货币存量的变动，因而通货膨胀、经济萧条或经济增长都可以而且应当唯一地通过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的管理来加以调节。②

货币主义在英国的主要倡导者有：伦敦经济学院的利奥尼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和艾伦·沃尔特斯(Alan

① 参见《现在全都是货币主义者吗?》，《经济学家》1977年7月2日，第73—74页。

② 参见杰罗米·斯泰因(Jerome L. Stein)编：《货币主义》，1976年英文版，第1页；戴维·默米尔斯泰因(David Mermelstein)编：《经济危机读本》，1975年英文版，第437页。

Walters),曼彻斯特大学的戴维·莱德勒(David Laidler)和迈克尔·帕金(Michael Parkin)。

本稿着重评介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货币主义。

一、米尔顿·弗里德曼 何许人也?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年出生于纽约。他是美国新泽西州州立拉哲斯大学学士(1932年)、芝加哥大学硕士(1933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1946年)。1945—1946年执教于明尼苏达大学;1948年以后,他一直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曾经是该校保罗·斯诺登·罗素讲座“功勋教授”),并兼任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研究员。1977年他从芝加哥大学退休后,即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1967年以来,他一直担任美国《新闻周刊》的专栏作家,现正拍摄一系列的电视节目和录音,预定1979年向广大公众解说美国经济问题。

1935—1937年,弗里德曼曾在华盛顿担任自然资源委员会次席经济学家;1937—1946年(1940—1945年请假)在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做研究工作;1941—1943年,任美国财政部租税研究司首席经济学家;1943—1945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军事研究部统计研究组副组长;1953—1954年任剑桥大学富尔布赖特讲座讲师;1964—1965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1969—1971年,弗里德曼是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

弗里德曼是美国各种团体组织的积极参加者。他于1969—1970年任美国总统的“全部志愿军武装部委员会”委员；1971年以来，任白宫同事委员会委员；1957—1965年是《经济计量学》杂志编辑部成员；1967年，任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1970—1972年，任蒙特·皮莱林学会会长；他还是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员，并保有好些荣誉学位。他在美国，通过参加各种团体组织活动，领得许多奖品和奖金。

弗里德曼其人个子矮小，却好为己甚，专长诡辩，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被视为古怪人物。他常自认，谁个意见强硬，谁就最后胜利。因此，他发表了许多同凯恩斯主义“正统派”唱“反调”的政治经济学论文和专著。他出版的专门著作，主要有：《自由职业收入》（与西蒙·库兹涅茨合著，1946年）；《抽样调查》（与其他人合著，1948年）；《实证经济学论文集》（1953年）；《消费函数理论》（1957年）；《货币稳定方案》（1959年）；《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年）；《价格理论：一个假定题目》（1962年）；《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与安纳·吉·希沃茨女士合著，1963年）；《通货膨胀：原因与后果》（1963年）；《国际收支：自由汇率对伸缩汇率》（与罗伯特·弗·鲁萨合著，1967年）；《美元与赤字》（1968年）；《货币最优数量和其他论文》（1969年）；《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与沃尔特·伍·海勒合著，1969年）；《美国的货币统计》（与安纳·吉·希沃茨女士合著，1970年）；《货币分析的理论结构》（1971年）；《社会保障：普遍的还是选择的？》（与威尔伯·吉·科亨合著，1972年）；《经济学家的抗议》（1972年）；《失业对通货膨胀：菲利普斯曲线的评价》（1975年）；《价格理论》（1976年）。

尽管弗里德曼自以为，他的货币主义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挑战，可是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眼里，他却是“保守主义者”；他在智利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广大革命人民与社会进步人士中已是声名狼藉，被斥责为“极右派”或“右翼激进主义者”。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约二十多年来，弗里德曼及其同事阿尔诺尔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致力于智利经济的宣传和智利留美学生的培养工作。他同哈伯格等把到芝加哥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智利学生置于智利天主教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之间商定的长期协议的控制下，竭力向智利学生灌输他的“货币主义”和“自由经济理论”，贩卖他的“市场均衡论”，通货膨胀与垄断经济组织无关，以及失业率水平“正常化”等反动谬论。为反对智利摆脱美帝国主义等的压迫、剥削、掠夺、控制，走向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弗里德曼及其同事攻击阿连德政府在智利努力实行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政策（包括外国公司国有化）是什么“荒谬办法”。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殉职。弗里德曼竟诬蔑说：“不论怎样，多少由于通货膨胀，智利的总统阿连德丢了性命。”^①约在二十年前留学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得博士学位、在弗里德曼指导下的“工作室”做过研究助理的安雷·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三年前曾公开揭露弗里德曼和哈伯格贩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型”对智利经济所造成的种种恶果。^②

① 《通货膨胀与指数化论文集》，1975年英文版，第45页。

② 参见安雷·贡德·弗兰克：《致阿尔诺尔德·哈伯格、米尔顿·弗里德曼一封关于智利的公开信》，《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75年夏季号，第61—76页。

1976年10月，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他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第十二个人。^①在此以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著作在论述如何稳定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大政策问题时，除海耶克等少数人而外，基本上都是以凯恩斯的扩大政府管理经济作用的主张为根据。弗里德曼一向反对“凯恩斯革命”，他打着“对抗凯恩斯革命”的“新自由主义”旗号，竭力要拆毁凯恩斯经济学，换用一种降低政府作用的宏观经济政策。他所提出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本是“异端邪说”或

① 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实际上是属于纪念奖，因为它是由瑞典中央银行在1968年三百周年时为纪念诺贝尔奖金(1901年设立)的积累者而设立的基金中支付，所以，它不同于由甘油炸药发明者诺贝尔(A. B. Nobel)所留下的资金中发给的诺贝尔奖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1969年开始颁发，历年获得者是：1969年——弗瑞希(R. Frisch, 1895—1973，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和丁伯根(J. Tinbergen, 1903—，荷兰鹿特丹大学教授兼中央统计局局长)；1970年——萨缪尔逊(P. A. Samuelson, 1915—，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71年——库兹涅茨(S. Kuznets, 1901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1972年——希克斯(J. R. Hicks, 1904—，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和阿罗(K. J. Arrow, 1921—，美国哈佛大学教授)；1973年——里昂惕夫(W. W. Leontief, 1906—，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现退休，任纽约大学教授)；1974年——海耶克(F. A. Hayek, 1899—，曾任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现任奥地利利比亚堡大学教授)和米尔达尔(G. Myrdal, 1896—，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1975年——库普曼(T. C. Koopmans, 1910—，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和康托罗维奇(L. V. Kantorovich, 1912—，苏联科学院经济学通讯院士、数学院士，现在苏联国民经济管理研究所工作)；197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1977年——詹姆士·米德(James Meade, 1907—，曾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立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谈判等活动，英国剑桥大学教授，1968年退休，现任英国“财政研究学会”所建立的一个委员会主席，从事英国税制改革的研究工作。)和伯特尔·奥林(Bertil Ohlin, 1899—，曾任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正教授，1944—1967年担任瑞典自由党领袖，1944—1945年任瑞典战时联合政府商业部部长，现已退休)；1978年——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 1916—，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

“保守主义观点”。但是，第八次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却给予了弗里德曼。因此，这件事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引起了极大震动，人们纷纷议论起凯恩斯主义的存亡问题。我们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金不过是垄断资产阶级对那些死心塌地为他们效劳，力图挽救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治医师”们赐给的奖赏^①。面对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愈陷愈深的困境，凯恩斯主义药方一次又一次地失灵，情势如此险恶，垄断资产阶级不能不“病急乱投医”。因此，二十多年前就起来反对“凯恩斯革命”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现在得到了垄断资产阶级的青睐，是不足为奇的。美国著名凯恩斯主义者保罗·萨缪尔逊(Paul A. Samuelson)近些年来也认为：“假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根本不曾出世的话，把他设想出来就将有必要了。”^② 弗里德曼正是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当前需要而被抬出来的另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权威”。

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为了弄清楚货币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从“萨伊定律”到凯恩斯主义是怎样为资本主义经济辩护

^① 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米尔达尔也指出，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是带有“政治倾向的”，是“一种政治行为”。他认为，1974年，他和海耶克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是因为瑞典皇家科学院搞“狡猾的政治平衡动作”，他是代表“自由派”乃至“激进派”的政治观点，而海耶克则是代表“保守的”乃至“反动的”政治观点(参见米尔达尔：《经济科学的诺贝尔奖金》，《挑战》1977年3—4月号)。

^② 萨缪尔逊：《经济学》第10版(1976年英文版)，第848页。

而又不断破产的。

“萨伊定律”的破产

本世纪三十年代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一直死守着十九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中的“萨伊定律”：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因而他们竭力否认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要发生周期性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他们从“萨伊定律”出发，认为只要让市场供求力量自由活动，资产阶级政府不要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直接干预，资本主义经济就会自然地趋向均衡，而且达到“充分就业”的“最优”均衡状态。这就是过去资本主义国家信守的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由放任，政府充当“守门犬”（实际上后来政府对外已实行关税保护、进口限额等）的经济原则。三十年代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不仅给资本主义制度以沉重打击，而且宣告了资产阶级所谓“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的彻底破产。英国著名凯恩斯左派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指出：“那种保持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趋势的学说，未能经受住三十年代市场经济完全崩溃的考验”。^①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和失败

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后，为适应垄断资产

^① 琼·罗宾逊：《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美国经济评论》1972年5月号，第3页。

阶级的需要，出现了如何对付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凯恩斯理论。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了不同于传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论点。他认为在工资和物价随市场供求关系而自动调整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固然可以趋向均衡，但不一定能达到“充分就业”，而是出现“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他进而断言，资本主义社会的就业水平主要取决于消费者和企业家得到多少收入并花费多少收入在物品和劳务上。因此，如果消费者（包括资本家）不把他们的收入全部用于消费，而是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如果企业家又不把他们的全部储蓄投资于新的厂房、设备，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到达“均衡状态”时候的就业水平就会低于“充分就业”，即出现大量失业。他提出，为了矫正这种状况，就需要政府积极引导更多的开支，即尽力扩大流通中的货币量和信贷，使整个社会有可能把更多的钱花费在消费和投资上。为此可以用减税（让更多的货币留在消费者和企业的手边）来增加私人的开支。但凯恩斯认为，如果企业家因无利可图而不愿扩大投资，就需要政府增加它自己的开支（包括通过增加纸币的发行和增加国债来增加开支），以弥补私人开支的不足。这就是凯恩斯主张的由政府干预经济，实行赤字财政和举债支出，利用膨胀通货办法，以刺激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避免经济危机，达到“充分就业”的所谓新的理论和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极采用了凯恩斯这套妄图“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失业的药方。

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如果对物品和劳务的当时需求超过整个经济在充分就业下所能生产的数量，那么通货膨胀就将

发生。这就是凯恩斯所声称的：“设当有效需求再增加时，已无增加产量之作用，仅使成本单位随有效需求作用比例上涨，此种情况，可称之为真正的通货膨胀”；或“所谓绝对通货膨胀，乃是在充分就业之下，再增加有效需求时所产生的情况”。^①为了遏制通货膨胀，凯恩斯主义者主张，政府应当采取行动，减少它自己的开支，或者提高税收，迫使消费者和企业把他们自己的需求降低到整个经济能满足而又没有物价膨胀的水平。然而，正如《每月评论》所指出的：“在原则上，政府财政的活动可以使经济膨胀，也可以使经济紧缩。在实际上，它们几乎永远是作为一种膨胀者而进行活动。”^②由于凯恩斯主义者特别强调运用财政政策（增减政府开支或增减税收）来调节经济活动，而把货币政策当作支配经济活动的次要的、辅助的手段，因而凯恩斯主义者有时又被称为“财政主义者”。

自从凯恩斯主义出现后，垄断资本集团及其政府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妄图为帝国主义作垂死挣扎。他们把凯恩斯的反动理论吹捧为什么“凯恩斯革命”，他们把那些推行凯恩斯理论和政策主张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在五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出现的经济“繁荣”，失业人数减少，以及虽然出现了持续的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率还不算太高这些表面现象说成是进入了“凯恩斯时代”。然而，他们未免高兴得太早了。从六十年代下半期起，特别是到了七十年代，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急剧提高，而那些受凯恩斯主义影响最大的国家也就是遭受痛苦最多的国家。《每月评论》指出：“过

①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258、257页。

② 《每月评论》1974年4月号，第3页。

去三十多年间如此放肆地抛出来加以利用的凯恩斯的办法，十分严重地反害了自己。向来受重视和受欢迎的那种温和的、刺激性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的通货膨胀，变成了汹涌的洪水，猛烈得无法控制，也不是任何一种传统的指数所能衡量的。”^①

而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是，通货膨胀愈快，预算赤字愈大，经济增长反而愈慢，甚至停滞萎缩，失业人数也愈多，而且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同时频繁爆发，愈来愈严重。因此，现在资产阶级经济文献中流行着一个新词，叫做“停滞膨胀”(stagflation)，它被用来描绘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产生的在同一时间内既有经济停滞或“衰退”和严重失业，又有持续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这样一个突出矛盾。面对着这样严重的现实情况，垄断资产阶级政府及其御用学者们也不得不承认凯恩斯主义失败了。不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凯恩斯主义的破产而哀伤；有的惊叹所谓“凯恩斯革命”是“一出悲剧”^②；有的谴责当前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是那些信奉凯恩斯教义的人造成的。^③

货币主义的旧调重弹

在上述情况下，自五十年代后期起，弗里德曼大放厥词，攻击凯恩斯主义，开始炮制所谓“现代货币数量论”。到了六

① 《凯恩斯的办法反害了自己》，《每月评论》“社评”，1974年4月号，第11页。

② 参见琼·罗宾逊：《凯恩斯革命的结果怎样？》，《挑战》1974年1—2月号。

③ 参见弗·海耶克：《通货膨胀与失业》，《纽约时报》1974年9月15日。